

国家粮食安全的逻辑机理与韧性提升路径研究

刘晓怡*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大国博弈与地缘格局动荡相互交织, 从外部环境层面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压力。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因素可以发现, 大国间的博弈主要借助贸易制裁、技术封锁、金融操控与航运控制等手段, 对非中心国家的粮食贸易形成系统性施压; 而地缘局势风险则通过进口源头切断、供应链中断以及市场价格垄断三条主要路径, 向国内市场逐级传导。面对这种复合型外部冲击, 应从多个维度协同施策, 在国内层面夯实产能基础, 在国际层面增强供应链韧性, 同时优化战略储备的动态调节机制, 并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合作空间。通过上述路径的系统性整合, 构建起以韧性为核心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从而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粮食安全; 大国博弈; 地缘政治风险

1.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然而, 长期以来大国博弈不仅局限于贸易扩张、科技封锁、行业垄断, 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博弈在近年来逐渐显现。肖晞、张一帆指出, 粮食武器化在历史上曾分别作为军事战争手段、外交强制手段以及金融介质手段而存在, 当前全球粮食武器化浪潮呈现载体多元化、对称性制裁、复制性增强等特点[1]。2022年以来的俄乌冲突、红海危机及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回潮, 持续冲击国际粮食贸易秩序。王明利、鄢朝辉的研究表明,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 国际农产品出口下滑, 乌克兰农作物产量下降、农产品出口减少, 俄罗斯化肥和能源等产品出口受限, 国际食品和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涨, 全球食物供应紧张局势加剧[2]。黑海粮食协议反复中断、红海航线受阻、单边制裁措施频出, 表明粮食已日益被工具化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筹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与进口国, 其粮食安全受外部环境影响显著。国内粮食产量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稳定在万亿吨以上, 小麦、大米等国库粮仓盈余。然而, 大豆、玉米等工业级及饲养类粮食人以进口为主要来源, 任然会受到国际粮食安全隐患的波动。谭砚文、杨世龙指出, 受地缘冲突、极端气候、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等因素影响, 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性显著增强, 印度

等主要粮食出口国陆续实施出口限制政策, 叠加厄尔尼诺现象下极端天气频发, 引发新一轮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冲击我国粮食进口国际供应链[3]。李俊茹等借助带有随机波动性的 TVP-VAR 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价格具有显著冲击效应,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较中国国内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价格的冲击更为剧烈[4]。

以进口来源集中度衡量, 大豆进口八成以上来自巴西和美国, 李天祥强调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持续扩大的同时, 粮食进口的品质品种、渠道来源等高度集中, 其粮食安全的隐患也随即扩大[5]。焦玉平也将这种结构性依赖概括为“供应链单一化陷阱”[6]。与此同时, 王天姿等基于翔实海运数据的分析发现, 中国粮食进口海运通道高度集中且固定, 美洲至中国的三条主要通道承载了超过80%的运输量, 且一半进口粮食经由马六甲海峡, 认为这种对少数通道的依赖性及运输方式的单一性, 会使中国粮食进出口受到威胁[7]。

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与国内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 使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越发不可避免的复杂局面。程国强、施嘉庚提出, 增强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8]。在此背景下, 系统识别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粮食安全的传导机制, 评估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结构性脆弱, 探索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风险, 会通过什么手段及路径去影响一个国

家的粮食安全?分析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既有前瞻性、又有韧性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兼具前瞻性与韧性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我国粮食供应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

2.1 大国博弈风险影响粮食安全的关系

当一国粮食进口依存度超过安全阈值,进口来源又高度集中于潜在博弈对手时,粮食便具备了战略筹码的属性。霸权国家借助特有粮食资源迫使其他经济体调整政策的能力,还通过主导市场制度来左右他国粮食贸易格局的制度性影响力。

俄罗斯拥有优渥的黑土地资源,其主要依托小麦出口之利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上站在屹立不倒的地位;美国则依托高新技术及集约式生产,在大豆出口上占据先锋。欧盟虽然耕地总面积相对有限,但依靠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和长期积累的育种科研能力,依然稳居全球粮食生产技术的前列。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也是重要的进口大国,在实现口粮绝对自给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庞大的粮食储备体系,对国际市场发挥着一定的稳定功能。上述国家在耕地基础、产出效率与技术积累等维度的差异化特征,构成了大国博弈初期粮食贸易领域工具性权力的基本底色。这些国家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在博弈格局中筑起自己的优势格局,各自掌握不同的战略蓝图。正是因为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与科技发展程度不一带给粮食贸易多元化格局,才使当今世界粮食贸易市场并未被任何一方所垄断。

然而,在港口交易制度的规制方面,美方依旧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就流通环节而言,全球最大粮商近八成在美欧旗下,这些粮商同样掌控着全球八成粮食流量,并能在运输主航运干道上做出影响。再看金融方面,全球粮食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美方便可通过贸易关税及货币汇率等对其他国家进出口粮食利润造成影响。技术层面同样如此,欧美在高端科技及专业设备上具有绝对专利且限制其出口政策,进一步对低端技术国家的生产技术发展造成限制。上述规制影响下,美欧像是树起层层障碍,即使是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或者是高端的生产科技,也必须在中心国家所设定的交易规则与流通秩序框架内运作,方能顺利接入世界粮食市场。霸权国家将粮食贸易武器化,通过操纵价格波动、切断技术交流渠道或施加金融制裁等

方式,对体系外围国家的政策选择施加外部压力,使粮食贸易背离纯经济逻辑,沦为服务于大国战略目标的强制工具。

2.2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粮食安全的关系

地缘政治风险对进出口贸易的冲击直接且显著。以2018年为转折点,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地出现明显调整,自巴西的粮食采购规模大幅增长,进口成本随之上升。此外,地缘政治风险还能够通过能源、化肥价格等间接渠道传导至贸易领域。中东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往往推高国际油价;而我国粮食进口高度依赖海运,运费频繁波动进一步加剧了进口成本压力。

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全球钾肥和氮肥的主要供应国之一,其化肥出口一旦受阻,国际化肥价格便易于上涨,进而推升国内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与此同时,还有通过市场恐慌与资本投机放大价格波动,俄乌冲突爆发后,黑海粮食出口受阻,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一度大幅上涨,恐慌情绪经由期货市场迅速蔓延。2026年以来,俄乌双方在黑海相互发动攻击,乌克兰经黑海港口出口粮食的能力已损约三分之一,部分大型粮商暂停港口运营,船东因安全顾虑拒绝驶入。

3.大国博弈影响粮食安全的手段

3.1 贸易制裁使粮食关税武器化

贸易动荡期间,大豆被推至博弈前台,即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反制关税后,美国对华大豆出口大幅萎缩,中国转而从巴西增加采购,但2019年自巴西进口大豆单价较自美进口每吨约高7美元,抬升了大豆的整体进口成本。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80%,国际价格与供应波动的传导最为直接;玉米、小麦等品种因国内产能支撑和关税配额管理,国际传导更多体现为预期层面的短期情绪扰动而非实质性冲击[9]。此次博弈的教训在于,关税反制虽对美国农业造成了压力,美国农业部为此推出两轮贸易援助计划,总额达280亿美元,但中国自身的进口成本同样上升,且对巴西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2025年贸易摩擦再度升温,中国自2月起对美国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15%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等加征10%关税;美国则以涉疆问题为由扩大对华出口限制,将限制范围从高科技领域向农产品贸易相关环节延伸。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粮食力量”外交,阻挠盟国向中国出口小麦,试图在国际

粮食市场上孤立中国。1980年,美国为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联合部分盟友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然而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并未严格落实禁运,反而趁机扩大对苏出口,美国农民因预期需求增长而逆势扩产,禁运后谷物价格大跌,农民损失惨重。粮食禁运能否取得实际成效,不仅取决于各粮食出口国行动的协同性与一致性,还取决于目标国能否迅速找到替代性进口来源。在缺乏联合行动约束力的情况下,单边禁运通常难以实现预期战略效果。但总体来看,贸易制裁仍是当前大国博弈中最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之一,其本质是将粮食这一普通商品转化为兼具战略意义与地缘政治属性的特殊武器。

3.2 技术封锁使农业自主遭遇瓶颈

隆平高科已有16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获得国家审定;登海种业相关转化体也取得生物安全证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获批转基因玉米品种共计161个。尽管获批品种数量持续增加,但差距仍不容忽视:在种质资源挖掘效率、性状聚合能力、专利布局密度等关键层面,国内企业与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种业巨头相比依旧存在不小差距。约翰迪尔、凯斯纽荷兰等美资企业长期占据高端大型农机市场,国内企业虽然在中小型农机上做到了自主可控,但大型联合收割机、精准播种机等高端装备仍然依赖进口。潍柴雷沃460马力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的问世打破了国外垄断,但单个产品的突破并不等于系统能力的跃升,液压系统、发动机电控单元等关键零部件仍绕不开外部供应。美方的出口限制措施也早已从芯片延伸到农机控制单元和精准农业传感器,意在卡住中国农业装备升级的技术接口,如此可看出,长期以来,美国在转基因作物与基因编辑技术领域实施严苛的出口管制,这种技术围堵客观上延缓了我国主粮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进程。

化肥领域同样存在卡点。中国是全球化肥生产大国,但高端复合肥、特种肥料以及生产所需的关键催化剂和装备,技术缺口依然明显。这三个领域所遭受的技术封锁,带来的不只是产量提升受阻。知识产权壁垒推高了品种权和专利技术的使用费,标准壁垒则增加了国产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认证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沉淀在中国粮食的生产环节,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在大国博弈转向长期化的背景下,如何在技术封

锁的缝隙中形成真正的自主突破能力,比单纯追求几个产品的国产化更为紧迫。[10]

3.3 金融操控对进口成本的影响

国际粮食贸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通过汇率、利率与资本流动干预全球粮价和贸易成本。有学者将美元、石油和粮食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位一体”体系。一个典型的传导链条是:美联储加息推高美元币值,以美元标价的粮食对进口国来说变得更贵;加息还促使资本回流,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本币贬值,粮食购买力被进一步削弱。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全球粮价飙升,多个发展中国家陷入粮食危机。在美元过量增发条件下,过剩流动性不断强化冲击粮食期货市场的投机性金融资本,造成粮食的金融属性与传统供求关系脱节,形成“粮食金融化”现象。货币超发—粮食金融化—进口国粮食安全风险,构成了一条清晰的传导路径。

支付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同样被美国用作工具。SWIFT作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金融报文传送系统,近年来频繁被西方国家用于实施金融制裁。俄乌冲突后,美国将俄罗斯部分银行踢出SWIFT系统,俄粮食出口结算受阻,被迫转向替代支付方案。中国目前虽未被排除在SWIFT之外,但美方多次释放对华金融制裁信号,一旦落地,中国粮食进口贸易将遭受严重冲击。

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也是美方施加影响的场域,金融资本借由操纵粮价、制造恐慌博取超额利润。此外,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把控全球八成以上粮食贸易流量,在物流、仓储、加工和销售全链条上占据支配地位,对粮食进口国构成结构性的价格与渠道控制。

3.4 航运控制使粮道的脆弱性提高

沿岸地缘局势突发变动、航道运力波动及海盗活动,都会直接阻碍粮食进口运输,美国《军力指数报告》将中国周边多个节点标注为高风险区域,地缘政治压力在上升;全球谷物贸易量预计同比增长1.8%,亚洲需求尤其旺盛,海运需求在往上走;但有效运力供给却在收缩,船厂订单减少、船舶老化加速、船员短缺使运价中枢上移[11]。巴拿马运河的现状受持续干旱影响,2024年6月运河通航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40%。后一事件与政治博弈无关,纯粹由气候异常引发,却足以阻断一条重要的粮食运输通道,可见航

运粮道的脆弱性之高。自然因素与人为风险相互叠加，意味着任何节点一旦发生中断，都有可能引发全球性连锁反应。

4.地缘政治风险的传导机制

4.1 进口来源单一化：替代依赖与新的结构性脆弱

自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贸易已连续多

年呈现净进口格局，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于巴西、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少数新大陆国家。表 1 以 2017 年为例，反映了这一结构性特征。时至 2025 年，这种集中化态势非但未有根本改观，反而在某些品种上呈现出依赖对象的转移与新的结构性脆弱。

表 1. 2025 年中国粮食品种主要进口来源地和数量

大豆		小麦		玉米		稻米	
来源地	进口数量	来源地	进口数量	来源地	进口数量	来源地	进口数量
巴西	8232.82	加拿大	271.26	巴西	160.72	缅甸	104.34
美国	1680.10	澳大利亚	102.06	俄罗斯	44.40	越南	71.57
阿根廷	789.00	其他	11.76	缅甸	28.87	泰国	67.98
				其他	30.78	印度	27.48
						其他	38.85
五国进口总量	10701.92	五国进口总量	385.08	五国进口总量	264.77	五国进口总量	310.21
五国进口占总进口比例	95.7%	五国进口占总进口比例	100%	五国进口占总进口比例	100%	五国进口占总进口比例	10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信息网以及根据海关数据计算得出（单位：万吨）

大豆进口虽然在总量上继续增长，但来源集中度并未有效分散，反而在对美依赖下降的同时加深了对巴西的依赖，形成“替代依赖”困局。其次，小麦进口来源高度固化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几乎排除了其他来源的替代空间，风险敞口较为集中。再次，玉米进口来源虽较 2017 年有所拓展，乌克兰因俄乌冲突退出市场后，巴西迅速填补空缺，来源替代的背后仍是对单一国家的深度依赖。最后，稻米进口来源相对多元化，但缅甸、越南、泰国三国仍占据近八成份额，且多为东南亚国家，区域集中风险依然存在。

从总体态势看，近年我国推进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国别扩展，但这种进展更多体现为贸易伙伴的简单更迭，并未有效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进口集中度。“替代型依赖”依然主导着进口格局，风险分散的预期目标尚未达成。一旦主要来源国因气候变异、出口限制措施或地缘冲突而供给收缩，我国进口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将面临显著扰动。由此看来，如何在来源结构调整中实现真正的风险解耦，而非仅完成产地名称的替换，仍是粮食安全战略中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命题。

4.2 供应链中断：产区冲突、港口封锁与实物链条的断裂

从表现形式来看，粮食的地缘政治运用大致有两种路径。首先是将粮食供应作为制

裁筹码，通过出口封锁或粮食禁运施加压力。俄罗斯作为全球化肥的主要出口国，被美西方制裁后，国际化肥价格暴涨，全球种粮成本被整体抬高，最终压在消费端[12]。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切断其粮食外运的主要通道，乌克兰粮食出口量在短期内骤降约 70%，只能转而依赖多瑙河沿岸港口和陆路通道，物流成本大幅攀升，运输效率明显下降，中东与非洲约 50 个国家的粮食供应在短期内受到波及。中粮集团在乌克兰的粮食及油料加工业务也因此受到冲击，原料到厂中断、工厂运转受阻，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正常年份。其次，粮食贸易常常被用作经济杠杆，部分国家借助粮食援助、低价出口换取战略资源与外交支持，或是通过市场操纵手段影响国际粮价。美国自 1985 年起实施的《粮食促进法案》就是典型案例，该计划将粮食援助与受援国的农业政策改革、农产品市场开放深度绑定，既帮助美国消化国内农产品库存、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客观上削弱了其他国家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影响力。

对我国而言，供应链中断风险突出体现为粮食进口来源高度集中，2024 年巴西遭遇特大干旱，大豆减产推动国际大豆价格上行，直接抬高了我国的进口成本，这正是供应链断裂风险从源头向终端传导的现实缩影。

4.3 价格剧烈波动：市场恐慌、资本炒作与输入性通胀

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且烈度不断上升，其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内外市场环境不稳定性加剧，粮食市场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回顾2000年以来的全球发展态势，地缘政治风险多次攀升至阶段性高位，标志性节点包括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急剧升级，以及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这些事件经由国际贸易秩序与宏观经济环境的传导链条，对粮食市场构成了多轮深层次冲击。2025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仍在持续累积，阿根廷临时取消又恢复谷物出口关税，引发市场短期内剧烈震荡；印巴紧张局势一度扰动国际大米供应与价格预期；中东冲突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被市场重新定价，能源成本与粮食运输链条的不确定性同步上升。与此同时，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2025年全年12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美国全年有11个月位居榜首，其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平均是第二名的近4倍[13]。

地缘动荡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冲击传导机制，可从三个层面予以审视。其一为贸易路径。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往往会倒逼进口格局发生重构。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我国自美国进口的大豆规模缩减了约51%，与此同时自巴西的进口量则攀升了25%。这种采购流向的急剧切换，实际上带来了新的结构性风险。其二涉及能源与运输成本。中东地区的持续紧张态势助长了国际油价的上行预期，考虑到我国粮食进口中超过九成依赖海上航线，一旦马六甲海峡等战略水道出现梗阻，运费层面的波动势必会显著加重到岸端的成本负担。其三关乎市场情绪与投机动向。恐慌氛围通常容易遭到资本的借机利用而被放大，已有学术文献证实，地缘风险水平同谷物期现货价格之间存在着多重分形的交织关联，其中玉米品种对于外界扰动的捕捉尤为敏锐，并且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还要甚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常规市场波动率所产生的作用。

除此之外，不同品类面对冲击时的抗压表现也存在明显落差。大豆的对外依赖程度突破80%大关，这使得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起伏与供应变化能够以近乎原样的幅度渗透进国内体系；相比之下，玉米与小麦凭借本土产能的兜底以及关税配额机制的屏障，海外盘面的震荡更多只是停留在情绪面上的短暂干扰，很难造成深层次的实质损害。着眼于时间轴的推移，地缘事件爆发之初通常会激起较为猛烈的市场反应，但随着储备粮源的

入市以及进出口策略的灵活调度，市场内生的定价机能会逐渐发挥作用，促使波动趋于缓和。

虽然2025年全球谷物产量预期创下新高，供应基本面相对宽松，为缓冲外部压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与极端天气等因素相互叠加，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及不确定性仍在持续抬升[14]。

5. 以韧性为导向：粮食安全治理的核心策略

5.1 国内产能：突破技术封锁，夯实自主根基

大国博弈对粮食安全最深层的威胁，不在贸易断供的短期冲击，而在技术封锁对国内产能提升潜力的长期压制。因此，产能建设的核心命题，不是“多种几亩地”，而是“能否在种子、农机、化肥等关键环节摆脱外部掣肘”。

种子可视为破局的首要切入点。客观来看，我国主粮作物的种源自给率确实不低，但在转基因性状研发、基因编辑等尖端赛道上，始终受制于美欧构建的严密专利网。尽管像隆平高科这样的龙头企业近几年陆续拿到了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可一旦放到全球坐标系里跟拜耳、科迪华比拼种质资源的挖掘效率和性状叠加能力，短板依然明显。眼下最紧迫的事，是把基础研究和商业化落地之间的断层补上，让生物育种的科研成果尽快走出温室、扎进大田。这里有个值得留意的隐患：国内持证种企虽然数量庞大，但大多体量偏小，研发资金也分散，与其各自为战陷入低端同质化竞争，不如主动对接先正达这类已纳入中资版图的国际平台，借助其技术积淀实现协同突围。

农机装备的处境则呈现出另一番结构性尴尬，高端上不去，低端挤破头。国产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喂入量指标和智能控制方面这些年确有进步，可往机器里头看，液压件、发动机电喷模块这些核心部件基本还是海外品牌的天下。如今国内农机市场整体需求疲软，全行业利润被不断摊薄，指望单个企业靠自有资金投入去啃硬骨头，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实质性突破。

更为现实的路径在于，依托国家重大技术专项进行集中攻关，同时将农机升级与智慧农业场景深度结合，借助数字化转型反向驱动装备性能提升，而非简单地追求“替代进口”这一目标。

5.1 国际供应链：破解替代依赖，构建多元韧性

进口来源集中化是当前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结构性脆弱,大豆对巴西和美国的依赖超过八成,虽然巴西在耕地资源、气候条件及生产成本方面的综合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大豆供给体系中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表面上是对美依赖下降,实则形成对巴西的另一种依赖,来源国从两个减为一个,风险敞口反而扩大。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量”的分散之外寻求“质”的突破。

从数量层面看,陆路方向的增量潜力确实不应忽视,中亚五国、缅甸、老挝等陆路邻国,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具备一定的供给增量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当前海运主导格局下的集中性风险。因此,进口布局的调整重点不应放在对单一国家采购量的硬性压降上,而应着眼于构建更具弹性的来源结构。具体而言,可通过签署长期采购协议锁定基础供给、参与海外种植环节的联合投资以嵌入当地产能体系、在关键物流节点布局前置仓等方式,增强在不同主产国之间进行货源切换的灵活性,而非简单追求各来源地份额的机械均衡。

从质量角度看,中国企业需要向价值链上游延伸,直接参与海外粮源基地和港口运营。中粮等企业已在南美有所布局,但相比四大粮商,我们对源头种植、物流枢纽的控制力依然偏弱。而且地缘政治风险意味着商业投资很容易遭遇征用或制裁,单靠企业自身难以规避,需要政府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外交途径提供制度性保障。

再来看陆路通道,其战略价值值得重视。中欧班列的运量虽远不及海运,但陆路可以保证最基本的运力不中断。下一步的重点是推进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的扩能改造,切实提升班列运粮能力,让这条陆路通道真正具备实质性的备用功能,而不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另一条路”。

6. 结论

本文基于大国博弈与地缘格局动荡多变的当今形势,探究二者叠加对国际粮食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指出,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压力具体表现为贸易制裁、技术脱钩、金融定价权掌控及战略通道钳制四种形态;而地缘风险则通过进口集中度过高、供应链韧性不足及市场情绪共振等中介变量,逐级渗透至国内粮食市场。现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的短板集中体现为大豆进口的“刚性替代”困局、关键海运节点的“卡脖子”风险,以及种

业与农机装备领域的底层技术突破困境。

因此,提出的任性治理机制是,对内,应以生物育种产业化为抓手,集中力量攻克高端农机核心零部件与化肥等关键技术,通过技术自立打破外部压制;对外,不应仅停留在进口来源多元化的表层,更要构建具备自适应能力的资源配置体系。一方面依托长期贸易协定与海外产能合作,实现主供国之间的货源柔性切换;另一方面须实质性提升海陆空通道的运力储备与替代效能。此外,还需完善战略储备的吞吐调节机制,并强化对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干预能力,以此作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最后防线。

参考文献

- [1] 肖晞, 张一帆. 粮食武器化的演进历程、作用机制与应对路径[J]. 学术论坛, 2025, 48(1): 110-124. DOI: 10.16524/j.45-1002.20241218.001.
- [2] 王明利, 鄢朝辉. 俄乌冲突对世界及我国食物安全的影响与应对策略[J]. 经济纵横, 2022, (7): 97-106+2. DOI: 10.16528 / j.cnki.22-1054/f.202207097.
- [3] 谭砚文, 杨世龙. 风险叠加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9.
- [4] 李俊茹, 石自忠, 胡向东. 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15-26+186. DOI: 10.13300/j.cnki.hnwkxb.2021.06.003.
- [5] 李天祥, 许银珊, 钟钰. 我国粮食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化解及策略研究[J]. 经济学家, 2022, (8): 106-118. DOI: 10.16158 / j.cnki.51-1312 / f.2022.08.007.
- [6] 焦玉平. 跨国农业资本对中国粮食供应链的影响及其应对[J]. 农村经济, 2025, (5): 47-55. DOI: 10.26957/j.cnki.cn51-1029/f.2025.05.002.
- [7] 王天姿, 李天祥, 陈彦晖. 中国粮食进口海运通道布局特征、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J]. 世界农业, 2025, (7): 28-40. DOI: 10.13856 / j.cn11-1097/s.2025.07.003.
- [8] 程国强. 建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新范式[J]. 中国发展观察, 2020, (Z2): 12-13+46.
- [9] 张帅. 权力分配、资源筹措与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有效性[J]. 当代亚太, 2026, (2): 120-153+183-184..

- [10] 张亨明, 章皓月, 朱庆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粮食安全隐忧及其消解方略[J].改革, 2021, (9): 134-144.
- [11] 程世勇, 刘旸.国际粮食垄断资本与我国粮食安全[J].江海学刊, 2021, (5): 248-253+255.
- [12] 叶兴庆.加入 WTO 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J].改革, 2020, (5): 5-24.
- [13] 王建华, 赵彬, 李明锐.大国博弈下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传导机制、脆弱环节与提升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 2026, (6): 118-127.DOI : 10.16304/j.cnki.11-3952/f.2026.06.006.
- [14] 张锦华, 沈亚芳.粮食安全面临国内外五大挑战[J].人民论坛, 2019, (32): 22-24.